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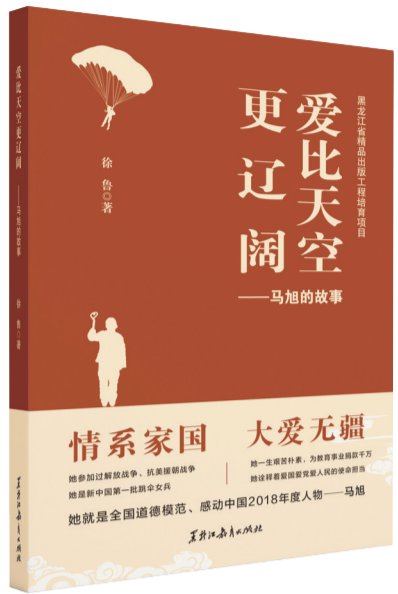
徐鲁《爱比天空更辽阔——马旭的故事》

长空有梦，大爱无疆

□高方



马旭



说起马旭未必所有人都有印象，但说起2018年感动中国颁奖礼上那位身着中国空军迷彩服、将毕生积蓄千万元捐献给家乡的身材瘦小的老奶奶，恐怕许多人的记忆都会在瞬间被唤醒。徐鲁的新著《爱比天空更辽阔——马旭的故事》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让人从文字中感受到这位共和国老兵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的长情大爱。

马旭，193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木兰县，从小跟随曾经做过清朝御医的姥爷学习中医知识，14岁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又主动深造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因为怀揣“强军”梦，空降兵部队重组时，马旭克服重重困难，毅然从零开始艰苦训练，成为共和国第一批跳伞女兵的一员。晚年，马旭将自己省吃俭用得来的毕生积蓄千万元捐献给自己的家乡木兰县。正如感动中国颁奖词所说：“少小离家，乡音不改。曾经勇冠巾帼，如今再让世人惊叹。以点滴积蓄汇成大河，灌溉一世的乡愁。你毕生节俭，只为一次奢侈。耐得清贫，守得心灵的高贵。”

在徐鲁的笔下，马旭的一生如绚丽的画卷徐徐展开——幼小时，她不畏艰险上山采药，10岁就不顾个人安危随姥爷上山为抗联治伤；解放战争中，她是身背医药箱的卫生员，也是手拿步枪的战斗员；抗美援朝战争中，她是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也是用歌声为战士带来安慰的“战地小百灵”，并以此吸引了后来相守一生的爱人颜学庸；在武汉陆军总医院工作时，她因为出色的业务能力被“点名”为开国将军实施手术；为了自己热爱的跳伞事业，她主动放弃了生育，并创造了三项中国之最——伞龄最长的女兵、跳伞次数最多的女兵、实施空降年龄最大的女兵；51岁后，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批准执行跳伞任务，出于对空降兵战友身体安全的考虑，她又拉着丈夫颜学庸成了发明家，取得了从早期的充气护膝到后来的单兵高原供氧背心等一项又一项专利。他们先后获得了爱迪生国际金奖、紫荆花国际金奖等重要奖项，有些发明至今还在部队使用，马旭也有了“军中居里夫人”的美誉。

徐鲁用他错落有致的笔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多才多艺的马旭，也使得这部书具有了独特魅力，它是传记文学，是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也是可以传递给下一代的精神火炬。

身为鼓书艺人的母亲用《杨门女将》《花木兰》《岳飞传》等作品，早早地在马旭的心中扎下爱国爱家的根须。姥爷冒着生命危险为抗联部队送医送药送粮的举动，让马旭明白了什么是民族大义。以小杨哥哥为代表的抗联战士的言传身教，让小马旭对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有了清晰而朴素的认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铺垫，东北解放之初的1947年，年仅14岁的马旭就决然地参军入伍，直到1976年才有机会重返故乡并为亲人重修墓地。马旭请工匠在父母的墓碑上刻下了“为人类贡献一切，为革命万古长青”的碑文，她自己也用一生书写了对党和人民诚挚的爱。

马旭的成长史中从未少过家庭与亲子的教育和陪伴，只不过她读的更多是“无字之书”。母亲用慷慨激昂的大鼓书启蒙了她的家国意识，祖父则带她上山采药，认识自然。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御医不但带她走进医学世界，也让她了解故乡的物产，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知不觉接受环保意识的同时，东北地方民俗文化也悄然走进马旭的内心，让她在数十年远离故乡的日子里也未忘记这片美好的黑土地。

解放战争时期卫生连的教导员大姐，一直被马旭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和革命的引路人。教导员大姐曾在苏联学习过，为马旭讲过不少苏联红军的故事，也介绍过包拯《右臂》在内的很多苏联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路》《青年近卫军》等作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了马旭的阅读世界，保尔·柯察金等英雄也成了她人生中的榜样。

马旭是第一批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的志愿军战士，电影《上甘岭》中和受伤战士们一起高唱《我的祖国》的那位坚毅而美丽的卫生员王兰的原型吴炯、为黄继光整理遗容的卫生员王清珍都是马旭的战友。马旭自己则在前线为“抗美援朝五大烈士”之一的孙占元无数次包扎伤口，甚至险些“光荣牺牲”在朝鲜。经历了三年多血与火的洗礼和生与死的考验，21岁的马旭在1954年初回国时，荣获一枚金灿灿的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保卫和平纪念章和一枚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等功勋奖章。后来，她也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的“致敬方阵”中。

《爱比天空更辽阔——马旭的故事》这本书是黑龙江省精品图书出版工程资助出版读物，作者徐鲁在书写内容、节奏把握、思想传递上的心得与技巧，使得这本书在适合全年龄段阅读的同时尤其适合亲子阅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兼具故事性、历史性和科普性。前两者无需赘述，科普性则是指作者藉由马旭的经历，不疾不徐地为我们进行了关于飞行、降落伞、跳伞等相关知识介绍。从写作技法上看，这“三性”均通过“套叠式”叙事得以实现。写小马上山为抗联战士送医送药时，嵌入了赵尚志和杨靖宇的故事；写马旭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时，嵌入了上甘岭战役、黄继光、孙占元等战斗英雄的故事、巍巍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许多惊险的战斗场景；写马旭“蓝天梦”的时候，嵌入了航空英雄杜凤瑞的故事和话剧《女飞行员》，并以诺曼底登陆为例介绍了空降兵在军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那些关于祖逊、南丁格尔、盖达尔、古丽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无不以“套叠”的方式出现，在丰富本书内容的同时也让马旭的成长有了真切而明晰的路径，让读者不难领悟到环境影响和成长氛围的重要作用。

当马旭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奋战时，弟弟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并写信告诉姐姐自己家里捐献了许多干菜、炒面、布鞋、牙膏、牙粉，几乎是有什么就捐什么。以这封家信为缘起，徐鲁精心查找资料，为我们介绍了马旭的故乡木兰对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前线的支持，这些带有精准数据的插叙也解释了晚年的马旭为什么要竭尽所能回报家乡。近年耄耋的马旭和爱人颜学庸将双燕衔泥般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千万元捐款汇往家乡木兰。马旭说：“这是我对家乡教育和木兰的后代们的一点心意，只要孩子能够接受好的教育，将来有知识、有力量建设祖国，建设家乡，那么我们家乡的发展就会永远充满希望。”

在书中，徐鲁两次用相当大的篇幅精准、细腻地描摹了北中国的绵延春意与勃勃生机。也许有人会觉得并非十分必要，但是这样的描写应该正好切中了主人公马旭的心情——那些不曾经历过漫长严寒的人们，不会理解东北人民对春天的热爱，而正因为经历了漫长的严寒，人们才会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春天，珍视潺潺流水、点点新花和独属于春天的明媚的希望。

创作谈

在解放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是出生入死、勇往直前的钢铁战士；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他们是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英雄儿女”，是全国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与和平年代里，他们是吃苦耐劳、享受在后的普通劳动者，是用闪亮的初心、艰苦奋斗的本色和忘我无私的奉献“感动中国”的最美奋斗者……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我的笔不去书写和讴歌他们的奋斗故事，不去礼赞他们忠诚的信仰和大写的人格，还当何为？

这是我在采访与创作马旭和她的战友、爱人颜学庸的故事过程中，一直萦绕在脑海的初衷和思绪。

近几年来，在多次尝试“主题写作”的过程中，我有一些真切的感受就是：它关乎文学和市场，更关乎情怀和立场。与其说这是一个需要谈论的文学课题、出版课题，不如说是一个心灵的课题、价值观的课题。具体说来，我有以下几点认识和感受：

首先，没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没有一种清晰、明亮和正确的价值观，没有一种对笔下的主人公、对一代代英雄儿女和奋斗者们的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热爱与敬仰，是写不好主题作品的。在一次次主题作品创作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每一次主题写作，无论是杰出的功勋人物，还是平凡的奋斗者与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写到一些共产党先驱者和革命先烈、共和国英雄和共产党员先锋和英模人物故事时，都像是在经受一次精神洗礼。我越来越认识到，一部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主题作品，一定不仅仅在于作者的文学技巧如何，而更是有赖于作家身上的某种情怀格局和“道德完整”。

其次，主题写作决不意味着对文学艺术标准的降低或放弃，恰恰相反，它要求作者必须把这些中国故事讲述得更加精彩动人。无论是报告文学、人物传记，还是更宽泛的非虚构文学，共同的前提都是“文学”。也就是说，仅仅有真实的报告、严谨的纪实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文学作品应有的品质。当然，英雄儿女和奋斗者们的故事本身，往往就足够丰富、曲折和动人，无须任何文学上的虚构。有时候，只要描述得当，文学的味道也自在其中了。但如何描述得当，就是对作者的文学功底和艺术剪裁能力的考验。

再次，主题写作的作品，不是书斋和沉睡的史料的产物，更多的是从主人公滚烫的奋斗历程和火热的当代创业史中采撷的鲜活故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接地气”，必须深入生活一线，深入主人公炽热的内心世界，用同样滚烫的心，用自己的身体、脚步去行走和丈量出笔下的故事的深度与高度。主题写作是“乌兰牧骑”式的创作，是带着大地气息的“报春花”，它要求作者必须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

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当下的青少年阅读，相比可口的快餐和甜腻的水果，更需要某些“坚果”营养。主题写作与出版，就是在为青少年一代提供阅读中的“精神坚果”。什么是阅读中的“精神坚果”？我认为一些真实的、非虚构的作品，比如科学家等杰出人物的传记故事，英雄儿女和英模人物、最美奋斗者的传记故事，还有一些重大科学成果、劳动成果背后的奋斗故事等，都属于这类“坚果”。新时代青少年的成长与阅读，需要“水果”营养，更需要“坚果”营养。换一个说法，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文学作品要起到“培根铸魂”的作用吗？

真诚地感谢地方政府的信任，给了我创作“感动中国”人物马旭和她的战友们的故事的机缘，也要感谢出版社和资深编辑团队的支持。马旭的故事不仅历史时间跨度长，涉及各个时期的史实、人物、事件、地点、甚至数据等也十分密集。他们不避繁难，帮我查找资料、核对史实，付出了极大的耐心、细致和艰辛。所以，我曾对编辑老师说：“如果价值观不一致，文学观、出版观也很难‘同声相应’。只因有一种共同的情怀，我们才能一起合作，最终成全了这本书。”

为青少年提供阅读中的「精神坚果」

□徐鲁

评论

冲破“看”与“被看”的镜像

——读诺亚的成长小说《云上日光》 □晏杰雄 张雨怡

诺亚的小说《云上日光》以儿童视角为切入口，展示了一幅儿童自我迷失和找寻的救赎图景。小说开篇就提到：“谁都不喜欢乔安安，就连我都不喜欢自己。”女主角乔安安不喜欢自己的原因并不是违反原则或是触碰底线，而仅仅是因为“谁都不喜欢我”，说明她处在“被看”的范畴之中。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面对镜子的“我”通过“看”来理解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乔安安依靠社会以及他人给予的想象的条件，开始在镜像中发生身份认同，从而描画出自己的自画像。然而，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先行的想象为本质的反映性幻象”，人在此过程中误认了主体，“我”看镜子实则是“被看”，最后投射在“我”身上的是他人的目光和面相，完成了“被看”的最终结果。

在《云上日光》中，乔安安的父兄充当了他者的角色，认为女儿应该在众人面前跳舞，应该会背诗，应该在其他人面前替自己博得面子，在这种近乎暴力的强制性凝视中，呈现出了受他者的理想认同支配的伪自我，使“我”在潜意识作用下用他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自己，并误认成自我。所以乔安安才会得出“每个老师都不喜欢我，每个客人也不喜欢我，就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结论。正是由于对自己认同的错位，造成了乔安安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的低姿态趋向，面对池默阿姨的眼神，她需要抬头确认“那里没有嘲笑和轻视”，而当池默阿姨肯定其绘画天赋的时候，“我俯下身，把脸埋在书包里，无声地哭了出来”。长时间对镜像自我的认同，失却的也正是自己，因此，当感受到真正的自己被理解和认可的时候，乔安安长期压抑和沉溺在“镜像之看”的那部分真实的自己，从泥沼中爬出，用无声的眼泪和斑斓的色彩努力赋予精神与现实分割带来的疏离感和异化感，从无意识的“被看”过程中挣脱出来，暂时摆脱镜像世界中众人的眼光，达到自我生命存在价值的体认与省悟。

语言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在语用效果中辩证地显现出两面性，基于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因素，语言的输出者和接受者容易出现某种交流层面的“断裂”，这种情况在儿童和父母的交谈中尤为明显。《云上日光》以儿童为站立点，将视角定格在“我”的框架内，承袭了“我”的感受性，对他者语言进行辨认、琢磨和调试，在先行性和贬低性话语的输出中不断降低自己的感受阈值，以维持社会关系的和谐感和统一性。当爸爸妈妈误解乔安安的时候，脑海中总是习惯性地浮现出先行的观念，更可怕的是，以成人的眼光对未定

的事情随意地下肯定式的结论：“我知道你讨厌弟弟”“你连长颈鹿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还画画？”这类来自外部的指认，是“象征域”的话语标识，而儿童在这种限制性的交流过程中，往往处于无力辩解的状态，来自父母的“权威”其实是压倒儿童精神自由和表达自由的锁链。“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心智还未发育成熟的儿童主体戴上了一副面具，鞭打着本心所向，将心中愿望隐藏地内敛和收藏，拙劣地尝试惩罚式的自我转向。然而，其幽深曲折的心理走向和不为人知的色彩感知在压抑又沉溺的亲子氛围中脱颖而出，激活了一种温和而又别致的童真趣味。

那么，乔安安是如何冲破“看”与“被看”的围墙的呢？一是作为反叛者的示威。她长期以来将父母的凝视作权威，并依照遵循，压抑的自我一直被潜藏和改造，当然，也在不断地冒出。当爆破的临界点被触发时，自我就会以火山爆发之势喷出，外显在主体身上，则是用语言和行为造成对象世界权威的挑衅。乔安安从第一次鼓起勇气对抗爸爸，越来越叛逆：“他让我阅读英语课文，我就去玩妈妈的手机；他想要管教我，我就把脸伸给他，让他随便打。”从横向上拉开了一条挑战威严的时间线，儿童主体的挑衅意味逐步增强，行为动作的变化更加大胆，叛逆者的姿态在“我”的人格中占据上风并指挥着“我”的大脑。在高权势和低权势交流中出现明显的倾斜和不等时，儿童只能用这种偏极端的方式，将自我包装成一个“叛逆又不懂事”的小孩，旨在对不公的判断提出控诉，从精神奴役中突围出来，狠狠敲碎“被看”的玻璃，揭开主体自身情感最广阔和真实的存在。

二是作为理想者的跳跃。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奋斗。”《云上日光》利用双线并行交织的方式，以“我”为故事圆心画圆，其中理性自我和现实自我好比时钟上的时针和分针，以各自的节奏游走着，却在某一时刻达到了统一。虽然“我”以他者的眼光来进行自我观照，但显然自我和他者之间并没有发生严丝合缝的粘附，而是在时空的缝隙中酝酿着自我的“越轨”，指向超现实的愿景和理想。患有通感症的乔安安对色彩表现出异常敏锐的感受力，并在心中种下了绘画的种子。在安安的世界里，“风是彩虹色的”“眼泪是海蓝色的”，一个文字、一个字母、一首歌都是有颜色、有生命的，而安安就是那个目光如炬的调色师，可以把世事浮沉和情感激荡进行天马行空的重塑，并和色彩搭配



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当然，儿童在迈进理想自我的途中也少不了引路者，这个人就是池默阿姨。她是穷途末路的艺术家，拥有着一双能够发现天才的慧眼，是使低权势双方关系破冰的调解者，是儿童迷途心灵的启蒙者，是可以依靠和信任的倾诉对象，即“云破日出之前，云层上面那一片亮眼的橙光”。安安与池默阿姨平白细碎的相处过程在细腻的日常书写中沉淀出厚重的力量，诺亚收集儿童成长中的生活边角料，将琐屑又鸡零狗碎的生活日常审美化，用连贯的线条勾勒出安安的心理路线，深度挖掘人性真善美的元价值，并用唯美主义的画风进行铺陈。安安对池默阿姨美好又深刻的感情成为实现自我理想的精神支柱，流露出一种情感的激荡之声。小说结尾说：“我会一直等池默阿姨，会一直画画，画山川江海、苍茫大地，会努力让我的画配得上她的名字。”在最后的时刻，乔安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钟摆，在摇曳的生命旋律当中，达到中正平和的状态。一种带有“宣誓”意味的语言表达配上舒缓的叙述节奏，柔婉中具备安顿人心的力量，浸润着的是充满温暖、贴心而又有穿透力的人生哲学。

《云上日光》以较短的篇幅勾勒出儿童与成人、迷失与救赎、理想与现实、故乡与返乡、欢欣与虚无等主题的多维透视图，同时用特殊写一般，揭示出了当代儿童教育的普遍现实问题，为当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处关系提供了解决路径。诺亚全程以孩童的笔触，笔锋所至，每每落下儿童独有的眼光和情感趋向，快慢有致的叙事节奏曲折地展现出中心人物之间的关系，或剑拔弩张，或温情脉脉，恰好是将儿童从“附属”当中解救出来，赋予其独立的作为个人的思想和心理，并通过儿童视角这一横截面向外发散，穿过社会表层，抵达超越物质规定性的精神自由。由此冲破“看”与“被看”的镜像，成就了一种清明、温和的生命喟叹。

动态

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精神。”2月21日，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高洪波、张之路、海飞、徐德霞、马光复、陈晖等多位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围绕中国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的方向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交流。会上还发布了第二届“长江杯”中国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获奖名单。

该活动由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旨在促进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鼓励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关注当下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本届征集活动于2021年6月11日启动以来，共在全国征集到400余部作品。经严格评审和慎重考虑，一等奖空缺，两部作品获二等奖，三部作品获三等奖，四部作品获入围奖。

与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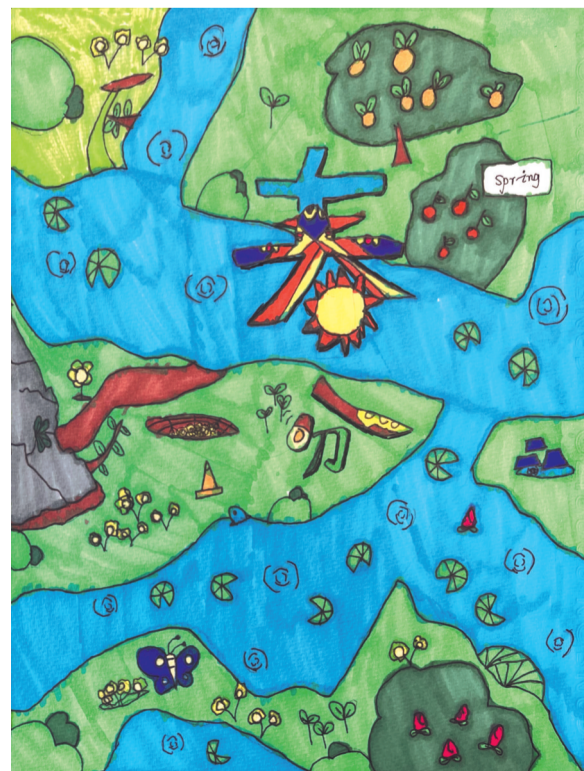
品应该下笔有力道、内涵有深度。期待更多作家磨炼好基本功，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也期待出版社继续挖掘好作家、好作品，推出更多既有创新性又有深刻性的精品力作。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多元的，作为创作方法，儿童文学中“现实主义”自有其特殊性，应在遵守儿童阅读习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刻性和力度。“长江杯”征集活动与主题出版的趋势相吻合，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和新人，回应了新时代对儿童文学的呼唤。

会上，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龙介绍，首届“长江杯”获奖的十部佳作已全部出版，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力。第二届“长江杯”征集活动中，作家身份更加多元，作品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出版社将进一步擦亮“长江杯”品牌，力争打造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梦工厂”。

（儿文）

童心世界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三八期

春分 王子何十一岁作